

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明意义 九州共贯、多元一体

□ 乔清举

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形成了数千年“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这一讲话昭示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特点，是理解中华文明传统的精神气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指南。

“大一统”理念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意义

在历史上，“大一统”的概念来自对《春秋》的解释。《春秋》原为鲁国国史，因孔子晚年对它进行过编订整理工作，故从一部国别断代史上升为儒家权威经典五经之一。古人认为，孔子编《春秋》，用寓褒贬于一字的方法寄托了自己的“微言大义”，所以解释《春秋》，体察孔子之意遂成为儒学的一项重要工作。据传说，孔子的弟子子夏传授《春秋》给齐国人公羊高，高传授《春秋公羊传》，提出了“大一统”的概念。《春秋》的第一句话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释说：“元年者何也？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句话中，“君”指鲁隐公，“元”指隐公即位之年。“春”是一年季节的开始。“王”是周文王。“王正月”，指周代历法的正月。用“王正月”，表明了“奉正朔”的文化观念，即采用周代历法，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春秋》何以特别地指出这一条？《公羊传》认为，这表明了孔子重视天下一统的“大一统”思想。所谓“大一统”，今天来看其实质是重视政治秩序、文明秩序的统一，通过文明秩序的统一来保障政治秩序的统一，达到万邦协和、天下大同的局面，具有积极的人类文明意义。

“大一统”概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华民族对自身文明的自觉。中国自古有越人、吴人、楚人、汉人、华夏、诸夏、夷狄等概念，而无

“民族”概念。中国不是一个欧洲意义的近代（modern）或现代“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仁爱理念为原则组成的文明共同体。“宅兹中国”。周天子居住的华夏地区是天下的中心、文明的制高点、诸侯政权合法性的源头。文明传播的方向是从高到低、由内向外，原则是“用夏变夷”，而非“用夷变夏”。“变”不是种族屠杀抢占土地，而是以德“感”人，以文“化”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文明传播的结果是边缘族群不断融入中国，成为天下的一部分，共同形成“天下观”“天下意识”。大一统原则高于华夷之辨。《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内中国而外夷狄”，又承认“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在这种文明观下，天下不是固定不变的政治建制，而是大一统的文化理念和文明追求。“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人之天下也。”

天下一体蕴涵族群共存，共存蕴涵和平。“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在历史上，团结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坚定的文化理念与文明追求，而不同于某种特定的政治架构。大一统的制度设计可以与时偕行，而大一统的文化理念则始终如一。公羊高所说的一统，当指周代以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封邦建国（“封建”）的政治体制秩序、孔子所说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礼乐文明秩序。“封建”体制在秦代为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所代替。郡县制具有超时代性，得到历代继承。董仲舒肯定大一统理念，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王吉传》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九州”乃《尚书·禹贡》对上古中国的地理区划，义同于“中国”。在传统“天下观”下，中国各地不是形成独立的“民族”意识，而是形成向往中心、向往文明的凝聚力，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中心—边缘”非但不是离心结构，反而是向心结构，形成大一统的文化理念，使“天下”超越历代王朝，孕育出普遍的“中华意识”“中国意识”。“中国”不仅是一个政治实体，还是一种文化精神、文化意识、文明意识。文化和文明不仅塑造了作为某个王朝的中国，也塑造了各个王朝背后的“中国意识”，使之成为一种超越地域、血缘和种族的文明力量、统一力量。“治国平天下”既是历代文人的家国情怀，也是历代王朝的文明追求。“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六合同风，四海一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王朝是特殊的，大一统则是普遍的。历史上，“中国”表现为不同王朝，但这些都不同王朝都有一贯的“中国意识”“中华意识”，都自觉地维护中华文明；都以承担“中国”为其意识形态，把自己塑造为正统；都有坚定的历史连续意识，为前朝修史。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分裂后重归统一，在一个王朝覆灭后又被新王朝担负起来，文化被激活并再次繁荣，就是这种超越的文化和文明意识发挥了动力作用。以仁爱为原则的文明自觉主动地塑造了不同于近代民族国家的族群共同体、文明共同体。中国的统一具有牢固的文化和文明基础。

“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及其在近代中国的形成

对中华文明而言，“民族”“民族国家”都是外来概念。西欧神圣罗马帝国灭亡后，各地民族意识觉醒，形成所谓“单一民族国家”，故英文“民族”（nation）又有“国家”之义。民族国家的形成促进西欧近现代进程的展开，推动了欧洲文明进步。但是，民族国家理念包含违背文明原则的“野蛮性”，其设定的国际关系原则是地缘政治、实力均势，平等是靠武力打出来的对等；实力不够，妄谈平等。所以，民族国家随各自实力的消长周而复始地陷入战争，沦为冲突之源。西方文化给这种野蛮性包裹上科技、工业、贸易等“文明”外衣，对发展落后的民族实施种族灭绝和殖民侵略。近代中国遭受的各种侵略掠夺，在“他塑”的历史学或文明学话语体系中即被视为文明对于野蛮的教训与征服。对于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来说，西方国家、民族国家、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是一回事，学习西方势必从“文明共同体”降格为“单一民族”、从普遍降格为特殊，从世界主义、大同主义、大一统的

天下观降格为民族国家观。让以仁义为原则的文明体或文明共同体降格为民族国家，接受丛林法则，岂不是从文明退回野蛮？这是文明的堕落。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文明有充分自信，不屑于走殖民掠夺的帝国主义路径。近代中国学习西方与日本相比迟缓，原因即在于此。

近代中国既要凝结“民族”意识，与列强抗争，又不能落入“民族国家”的陷阱。前人的探索艰难矣。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开始输入“民族”概念，可谓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他们同时也意识到，中国与西欧各国不同，历来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族群和谐共存的文明共同体。中国遭受侵略，并非汉人一族蒙难，也是满蒙回藏各族群共同的危难。可以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是中国近代史的真实写照。20世纪初，梁启超首先使用“中华民族”概念。1913年初，蒙古西部22部为反分裂通电全国：“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当一体出力，维持民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吞并中国，进一步刺激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于卢沟桥事变次日发表抗战宣言，提出“中华民族危急”，两处“中华民族”都指境内各民族也就是“全民族”。学者如顾颉刚等人发表文章，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可以说，近代以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自在地存在的；在近代以来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外侮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成为自觉的存在。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中华”“中华文明”自强不息的内在生命力。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人类治理方式的创新

“大一统”的文化传统涵养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创新，为人类处理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树立了典范，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色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通过民族识别确定了56个民族。基于民族现状和发展实际，“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而是“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而是“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治理体系是“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多元构成一体，一体方有多元。“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内涵。

单一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治理体系空前地提高了少数民族的地位，推进了民族平等，维护了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同时，这一治理体系在推动国家通用语普及、中华文化浸润各民族，建立共同的文化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团结统一。实现现代化，过上美好生活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也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愿望和基本权利。这一治理体系推动了各民族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同步前进，保障了各民族实现现代化的权利；同时，各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共同构成了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创造着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人类文明的格局、历史和中国的实践证明，单一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方式体现了中华文明传统的道义性特质，开创了人类国家治理的新模式，具有无比强大的发展动力、无比广阔的发展前途，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我们可以对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拥有自信的根本支点。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文化中的绿色底蕴

□ 王晓莉

绿色，属于中华色系五原色“青赤黄白黑”的扩充色系，指青色与黄色调制而成的间色。《说文·系部》，“绿，帛青黄色也”。关于中华五原色的最早记录见于《黄帝内经·素问》，之后为《周礼》记载。东为木、木青，南为火、火赤，中央为土、土黄，西为金、金白，北为水、水黑。五色对应五行，被儒家尊为“正色”，是地位最高的色彩。因此，像绿色、红色、紫色这些间色出现之后，最早是被统治者下令禁止在市面上出售的。孔子曾言，“恶紫之夺朱也”。但是这些间色后来大行其道，影响了传统五原色在人们心目中的受欢迎程度。

事实上，有别于儒家对所谓“正色”赋予的尊卑、等级意象，道家思想历来崇尚“自然”，推崇质朴素净的自然之色。老子言“五色令人目盲”，庄子提出“五色乱目，使目不明”。而自然之色当首推“绿色”，因在大自然中，自然之绿是无处不在的。对于原始社会的人们来说，繁茂的绿色草木不仅可以躲避危险动物的威胁，也是隐蔽地接近猎物、捕食它们的重要藏身之处。因此，“绿色是安全的象征”这一观念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信号灯采用“绿色”表示“前行”或“安全门”之意，其原因也在于此。

作为文字的“绿”，在先秦文献中主要就是指大自然界的植物、植物的颜色，以及用其染成的颜色。这种植物在中国古代被称作“王芻”或“葇”，现名葇草。《诗·小雅·采绿》，“终朝采绿，不盈一掬”。郑玄笺，“绿，王芻也，易得之菜也”。《说文·艸部》，“葇，王芻也”。《楚辞》中用“绿”表示植物颜色的用法有多处，“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绿叶兮素枝，芳菲菲兮袭予”。据考证，先秦时期即用“王芻”“葇”来对织物进行染色。丝绸史学者赵丰认为，战国秦汉时期，葇草染色采用绿矾（或其他含有

二价铁的物质）做媒染剂，控制适当的工艺，能得到一定鲜艳度的绿色。

古代中国创造出最早的化学颜料之一即为“铜绿色”，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它是铜金属经过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表层发生化学反应而产生的铜锈的色彩，化学名称为碳酸铜。这成为华夏文明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器时代文化进程的颜色。自此，“绿色”成为中国古代文人所画的青绿山水画中的主要用色。以《千里江山图》为代表，画家王希孟在山峦上采用了绿中带蓝的碧色，以石青和石绿等矿物颜料为主色，效果出奇。以“绿色”为主要用色的山水画蕴含着中国古人深刻的“山水观”，极具哲学的高度，寄信仰、生活、情趣、意境于山川地理、山水文化、山河国家，体现为对极高人生境界的追求，这与西方现代性意义上的主体性张扬有着根本不同。

作为“自然之色”的绿色，蕴含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自然观，是中华文化的底色。中华文化追求天人合一，认为人与非人万物处于一个连续谱系之中，“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人绝不超越于自然之上。相信存在一种整体性的秩序，人道与天道是内在一致的，“万物皆是一理”。美国富兰克林·H·金在《四千年农夫》一书中，详实记录了中国农耕文化中人与自然循环相生的绿色实践、绿色智慧，并对所创造的绿色奇迹发出了由衷的赞美。

作为“自然之色”的绿色，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底色。从焦裕禄率领全县干部群众在兰考县为应处“盐碱、风沙、内涝”植树造林，到谷文昌在东山县将“荒岛变宝岛”；从右玉县18任县委书记率领干部群众累积2亿人次坚持不懈治沙造林，到塞罕坝来自全国18个省份的三代林场人将高寒沙地

伟大建党精神，始终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青海工作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抓住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夯实基层党建基础、强化作风建设“三个关键”，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让各级党组织坚强有力，让各级党的干部充满浩然正气、无畏勇气、昂扬锐气。

党的初心使命是激励苦干实干永远的力量源泉，只有为干事者撑腰、为成事者鼓劲，才能不断激发团结奋斗的正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善于发现、培养、使用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真抓实干，关键要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为契机，紧紧围绕落实“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提振各族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政绩观是面镜子，映照的是干部的初心和使命、责任和担当。正确政绩观，就是从群众需求和客观实际出发，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不能主观臆断，不能简单化、片面化，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做为后人打基础、利长远、增后劲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谋划推进工作，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务虚功、不图虚名，以坚强党性立起正确政绩观的指挥棒、红绿灯。

切实做到以上率下。领导干部的作风直接关系到党内风气和政治生态，关系民心向背，决定着党的群众基础。领导班子也好，党员群体也罢，说得好不好干得好，承诺得好不如兑现得好。一些工作中的突出问题表现在下面，根子在上面，必须从上面改起，以“关键少数”引领带动“绝大多数”，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

建成世界最大人工林，再到古浪县立下种树治沙誓言的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他们与生态脆弱地区的恶劣环境作顽强斗争，将荒原变林海、沙漠变绿洲，他们为“绿色”底色而不懈奋斗的精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自然之色”的绿色，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底色，蕴含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伟力。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一书中就对西方工业文明提出过深刻的认识，“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中华文化的绿色底色和人类文明的存亡危机，共同决定了中国不会也不能走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尊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顺应古人朴素的自然观，同时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自觉以对规律的认识指导行动，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对象性世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理念是绿色的，发展方式是绿色高质量的，生产生活方式是绿色低碳的。可以说，“绿色发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逻辑主线。它既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也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正引导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创造着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级干，既在实干担当、改进作风上站在前排，又在传导压力、压实责任上尽心尽责，形成上行下效、上率下行的良好局面。

发扬斗争精神。在青海，不发扬斗争精神，搞一团和气是干不成事的。注重改造主观世界，与自己身上存在的“老好人”思想、畏难情绪、懈怠心理作斗争，在自觉加强斗争历练上持续努力。特别是面对破坏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面对大是大非问题，坚持真理、勇于斗争，绝不含糊、绝不退缩；面对复杂矛盾问题，迎难而上、敢于斗争，绝不绕着矛盾困难走，更不能被矛盾问题吓倒；面对歪风邪气，旗帜鲜明、善于斗争，绝不明哲保身、爱惜羽毛，绝不态度暧昧、听之任之。

促进能力提升。党和国家事业越发展，对领导干部的能力要求就越高。提升政治能力，建立“学思想”常态化机制，严格执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批示的工作机制和党政“一把手”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批示贯彻落实工作规则，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提升思维能力，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深化、内化、转化工作，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总钥匙”。提升实践能力，把学习成果转化工作本领、思路举措并运用于实践，增强解决问题的新本领。

持续加强作风建设。党的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一刻都不能放松和停顿，关键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意志，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修订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的若干措施和省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制定加强省委领导班子作风建设的若干措施，强化以案促改专项教育整治和作风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持续拧紧全省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的螺丝，拧紧转作风、树正风、立新风的发条，以务实举措打出一套组合拳、整治出一个新气象。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作为青海人，作为青海发展的建设者，都要懂青海、爱青海、兴青海，都要攻坚克难、担当作为，始终让真抓实干成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鲜明标识，努力干出一番新事业、打开一片新天地、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青海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